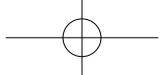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第
一
回

大过年的，辞个职吧

我如约来到系头办公室外间时，他的秘书白兰地正站在高脚桌电脑双屏幕后面。系里从去年兴起一种潮流，不少老师加高了桌子、撤掉了椅子，直接站着办公。白兰地见我微笑道：“来啦？”我点头还笑，她敲了敲套间的门探头进去说：“巍巍到了。”



两周前就和白兰地约见系头的的时间，她把我们的可选时间一对，最早的重叠是美国东部时间1月26日11点，恰逢中国农历年三十的凌晨。进屋之后，见系头也站在高脚桌双屏幕后，他脚下还有一个像传送带一样的小跑步机。他让我坐下等他发完手边一封邮件，不久他从跑步机上下来坐到我对面。

之前我们就谈话的内容已经有邮件沟通，于是直奔主题，意译下来是这样的。

系头：“你想回中国？”

我说：“对，这个机会很有吸引力，也对系里的国际交流有好处。我希望最好能停薪留职。”

系头：“我直说吧，我99%是不会答应你停薪留职。我需要你全时在这里，教书、科研、拿钱。你、我、他们是系里的新鲜血液，但不能体外循环。我希望你能重新考虑。”

他指指白板上贴的系里过去两年新进的九个教授的介绍明信片，我和系头都是其中一员，都在明信片的证件照上西装革履地微笑着。

我说：“谢谢您的坦率和好意。我也不兜圈子，我去意已定，停薪留职的主要目的是把剩下的几个学生带到毕业。”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机械系系馆里悬挂的
劳斯莱斯喷气发动机 Trent 1000，两个
这样的发动机驱动波音787

系头：“你这个方向系里缺人，不空出位置就没法招新人。你可以把学生过继给这边的老师，你做兼职教授就可以做共同导师。但是你要想清楚啊，终身教职何其宝贵，有人梦寐以求却没有拿到，比如贾老师。”

我有些意外：“是吗？”

他点头：“更麻烦的是，因为贾老师要走，他爱人方老师恐怕也留不住了。”（贾老师和方老师都是美国人，这里只是取了他们名字发音的第一个字。）



我唏嘘不已：方老师是正教授，和我方向接近，当时就负责招聘我这个职位，自始至终都像大姐姐一样友善。“非升即走”是终身教职制度最残酷之处，这样的命运降临在共事一场的熟人身上，谁都免不了兔死狐悲的感伤。

此刻我也更理解系头凝重的眉头：我和方老师都教流体力学这门本科生基础课，我们若同时离开将令系里排课都捉襟见肘。

然而经历了半年多酝酿成的决心是不可能在此刻溶解的。我说：“想好了。我准备辞职。”

走出系办，我不禁感慨：人生如戏，“大过年的辞个职”这种春晚小品的桥段的的确确在自己身上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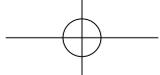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第
二
回



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发生地：
诺里斯馆

你从哪里来？

辞别系头已经接近中午，我约了同事小陈一起吃午饭。小陈和我不在一个系，反倒使有些事情交流起来更方便。他办公室和诺里斯馆（Norris Hall）相连，离吃饭的地方更近，我就先步



行穿过半个校园去找他。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虽然是公立大学，但校园建筑和谐古朴，给人一种厚重的私校感觉。这也是因为校方多年来非常注重新旧建筑风格的统一，连外墙都规定必须使用指定的藏青色“火鸡石”（Hokie Stone）。

尽管是冬日，在路上看到的许多学生仍是只穿着单薄的衣服。他们年轻、新鲜、火力足，就是可以穿得这么任性。他们步履轻盈毫不犹豫，似乎对前进的方向一清二楚。然而跟学生打交道多年之后，我知道他们会猛然发现大学生活如此之短，不久就要面临毕业与就业，挫折和打击会接踵而来。在入学时的美好憧憬与毕业时艰难现实的鲜明对比之下，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将面临保安和哲学家都会问的三个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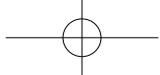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而这些问题是极不容易回答的。经常当别人问：“你从哪里来？”哪怕简简单单字面意思都要让我停顿想一想，联系当时的上下文，猜测对方到底是问什么。祖国还是祖籍？居住城市还是工作城市？本科学校还是博士学校？有时候实在搞不清楚对方意图还要先反问一句：“你又是从哪里来？”然后视对方回答来提供对等答案。

在美国的这十多年，我居留的地方北至康涅狄格州的新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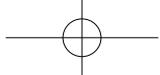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南至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中至弗吉尼亚州的黑堡。无论我回答来自任何一个地方，对方通常都会说：“哦，你那里发生过枪击案。”这是事实：2016年奥兰多夜店枪击案50人遇难；2012年康涅狄格州新镇小学枪击案26人遇难；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32人遇难。

走到了诺里斯馆，那是一座典型的大学建筑，庄重古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抚平了一切表面的创伤，看不到一点曾经的惨烈悲壮与惊心动魄。学生们鱼贯出入，忙碌地奔向食堂或课堂，有些孩子恐怕都不知道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就发生在这座楼里。10年前的一个早晨，一名华裔学生怀揣三把枪和400多发子弹来到诺里斯馆。他从里面把三个大门都用链条锁上，随后进入206教室和207教室突然开火，15名师生当场遇难。凶手试图进入204教室时，力学系利布雷斯库（Dr. Liviu Librescu）教授闻声果断把门反锁并指挥学生跳窗逃脱。愤怒的凶手朝门猛烈射击，利布雷斯库教授拼死顶住教室大门，为22名学生成功逃生赢得了宝贵时间，而他自己身中5弹遇难。

利布雷斯库教授作出如此壮举的时候已经是76岁。经过这里我常忍不住想象，如果当时换作是我的教室，自己会怎样做？我很清楚，不到40岁的自己恐怕没有勇气去冲在最前面，因为在这



个年纪牵挂的、未竟的、未经的都太多太多。但若真是在已过古稀接近耄耋之年的时候，倒极有可能冲上前去给生命奏响最后一个响亮的音符。人的想法、做法和终极目标与生命时间轴有巨大的关系。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辞职是件有冲动成分的事情，而再不冲动就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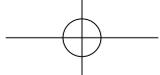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第
三
回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写基金

走进小陈的办公室，小陈边笑着跟我打招呼边起身披上外套。小陈是第二年的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AP)，标准的学术小鲜肉：三十出头，正是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年纪；聪明能干，清爽敏锐，举手投足都散发出AP的典型双重气质：骄傲与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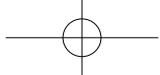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AP完全有理由骄傲。在美国找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每个AP的位置都有上百人申请，几乎个个都是一路名校加好文章若干。



经过电话面试、校园面试等全方位考察之后，最终突出重围拿到聘书的基本上都是综合素质出类拔萃的幸运儿。

AP完全有理由焦虑。入职之后六年的终身教职倒计时 (tenure clock) 就开始了。这就像要拆一个定时炸弹，如果六年考核不达标，终身教职的梦想会被炸得灰飞烟灭。这些指标包括带研究生、教学、发表文章，以及斩获研究基金。AP对写文章驾轻就熟，带学生和教学只要花些时间也不是问题。分量最重也最难的是获得真金白银的基金支持。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这一档州立学校工科AP要拿到100万美元才算过及格线。如果不作医学或者国防研究，在美国主要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一个NSF项目从30万美元到50万美元不等，也就是说一个AP要拿到两个NSF再加上其他一些小钱心里才踏实。而NSF的资助率逐年走低，过去几年都徘徊在10%左右。这些数据摆在一起，再加上脑海中嘀嗒嘀嗒的教职倒计时，再阳光自信的男孩也难免偶露愁容。

小陈书架上摆着他三口之家的温馨照片。他儿子现在两岁多。我做AP第二年的时候女儿也是两岁多。小陈太太工作在外地，开车要三个多小时。我和媳妇也是聚少离多，远的时候隔好几个州，直飞也要两个小时；现在虽然在一个州，开车仍要两个多小时。这就是典型的AP面临的工作之外的挑战：孩子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配偶通常也是高学历并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却很



难在同一个城市找到相应工作。看到眼前的小陈就仿佛见到了六年前的自己。

坐下吃饭时小陈第一句话就是：“我的NSF被拒了。”我必须安慰他，因为六年前的自己也是曾经需要安慰的。根据我积累多年的求安慰、被安慰和安慰人的经验，我知道安慰一个觉得自己惨的人很管用的一招就是讲自己也曾经惨过。于是我开始给小陈讲我的第一次NSF被拒的经历。

那是在我入职不久，正是踌躇满志之时，写第一个本子像蜜月期的新媳妇做针线一般，呕心沥血、花团锦簇、爱不释手。本子投出去之后就每天刷屏多次查状态，从孤芳自赏到自怨自艾，逐渐陷入怨妇状态，直至看到系统里显示猩红的“Declined”（不予资助），终于变成了绝望主妇。恼羞成怒之下啪地合上电脑冲出门透气，刚巧碰到了周老师。周老师是传热学领域响当当的学者，学术与行政俱佳，做过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德高望重，深受大家爱戴。见到他慈祥的样子，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的NSF被拒了。”那时的委屈无助，简直就差扑到他宽阔的肩膀上哭泣了。深谙安慰之道的周老师带着他一贯和蔼的笑容缓缓地道：“我前七个NSF都被拒了。当时我都想不干了。”我目瞪口呆：周老师出道是三十年前，获得NSF要比现在容易许多。况且周老师的博士导师乃是华人学界中的泰山北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任校长田长霖先生。他如此显赫的学术出身都要经过这等



打击，我也迅速平衡且平静下来。

望着小陈略微放大的瞳孔，我继续讲：历史就是那么惊人地相似，我也是经过七次被无情拒绝，直到第八次才中。这个“中”字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不管当年高考、申请出国、找工作，甚至生娃，都没有如此强烈的“中”的感觉。面对我中基金后的痴笑，媳妇曾不屑地道：瞧你范进那小样。（她没想到的是，三年之后自己也做了AP，中了第一个基金仰天长笑的表现与我当时并无二致。）

小陈若有所思，想必对“任重道远”又有了新的认识。午饭后走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整理着关于基金与海归的思绪。过去三十年美国NSF预算都没有本质变化，多年维持在60亿美元的水平，完全赶不上通货膨胀；相比之下，三十年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预算增加了300倍，达到240亿元人民币，很快要与美国持平。在中美基础研究投入此消彼长的趋势下，华裔教授纷纷把视线转向国内，寻找中美学术合作与交流的机会。所以过去几年我也积极与南京和西安的几所大学拓展合作，有了初步成果之后就开始考虑合作申请NSFC。

去年三月初是我的春假，我飞去南京与长期合作的一个教授合写海外合作基金。每年3月10日左右是NSFC最后冲刺的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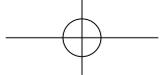


段，整个中国学术界都在聚精会神忙这一件事，见到熟人三句话之内必要绕到基金上来。关于基金有许多段子，比如不论什么千古名句，后半句扯上写基金似乎都合适：

举头望明月，低头写基金。
 少壮不努力，老大写基金。
 夜夜思君不见君，原来君在写基金。
 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基金。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写基金。

我最喜欢的一句则是：“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基金。”这不仅仅因为我是洛阳人，更因为在南京市几位洛阳老乡的帮助下促成了我去年暑假被聘为南京一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使我自出国后第一次有整整三个月时间在中国，获得了足够充分的机会去深入了解国内高校发展的现状与机遇。





邓巍巍教授与陈十一校长合影





第
四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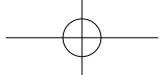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学术的江湖与桃花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学术圈与江湖有尤其多相通的特质。

比如，学术圈与江湖的核心关系都是师徒；

比如，学术圈与江湖出道之前都要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修炼；

比如，学术圈和江湖中的女弟子通常都要吃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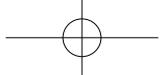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比如，学术圈与江湖都喜欢时不时开个英雄大会，台上走马灯似的秀，台下或喝彩或质疑；

比如，学术圈与江湖都讲究出身、门派、辈分、名号及地位；

比如，学术圈与江湖都是要闯荡的。

在这个和平年代，一面是绝顶高手的稀缺，一面是学术繁殖空前迅速，十年就可以是一代，论文数量更是呈爆炸式增长。现在行走于学术江湖的绝大多数人都非天赋异秉，要靠互相帮衬不拆台日子才比较好过。一篇文章或者一个本子投出去，也和古时候走一趟镖差不多：想要有惊无险平安送达，得仰仗朋友拔刀力挺，也得靠各路豪强时不时卖个面子。这里面三分靠实力，三分靠名号，三分靠行走江湖拜访各路神仙留下的善缘。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周老师曾对我讲，作为助理教授，你如果没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面跑是很难成功的。从这个角度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高校教师更加有针对性。于是，经常出差是必需的，让人家邀请自己去作报告也是必不可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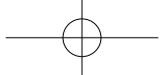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在南京期间，我向国内几所大学发邮件求被邀请作报告，争取机会宣传自己的工作并结交同行。其中一封邮件发给了南方科技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系的系主任。系主任对我的毛遂自荐表示



欢迎，很快定下了时间，就在5月底。我随即又联系求见南科大校长，他也正好有时间见我。

南科大2011年成立于深圳，自诞生起就备受瞩目，也不乏争议。五年多来发展势头极为迅猛，仅从高考招生分数来看，南科大已经达到“985”高校中游水平，这样的成绩对这所年轻的学校来讲实属难能可贵。南科大创校校长是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读相关的众多报道，印象最深的是朱校长卸任时以“惨胜”二字概括自己的任期，创业艰辛的种种既溢于言表又尽在不言中。2014年底陈十一院士成为第二任校长。陈校长是华人学界中极为罕见的在中美两国主流大学都有高级行政经验的人物。他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随即在北京大学创办工学院，之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他也是学术水平毋庸置疑的院士科学家：作为周培源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在湍流与格子玻尔兹曼方法领域的建树影响深远。从学科互补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由于朱校长是物理学家，他所建立的学科有极深的理科烙印的话，那么陈校长的工科背景使南科大增添了新鲜的工科色彩，其中力学与航空航天系就是其中浓重的一笔。

到深圳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先见到了系主任，他于常青藤名校获得博士，有在美国顶级国家实验室和公司工作的丰富经验，四年前以“千人计划”专家身份回国。他为人大气热情，给我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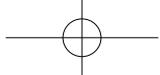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绍系里的情况和发展规划后就带我去见陈十一校长。

陈校长非常健谈，而且因为领域相近，共同话题不少。巧的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宿舍下铺的兄弟、婚礼的证婚人王教授曾是陈校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期的博士后。王教授是我见过的聪明人中最勤奋的，勤奋的人中最聪明的。他在美国曾获得国家实验室奥本海默杰出学者的殊荣，后来成为中组部首批青年千人²，并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正教授，是同学们都为之骄傲的。陈校长思路敏捷，问问题和答问题都是一针见血，几句话问下来就对我的情况把握得颇准。陈校长说：“你来南科大吧！”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答道：“这个不容易，我们家有‘two-body problem’（双体问题）。”陈校长摆摆手：“这在别人那里是问题，在我这儿不是问题。给你们俩一起解决，将来想跑都跑不了。”随后他挑重点讲了相关的海归政策、科研条件和个人待遇，我把听到的几组数字迅速除以七换算成美元，意识到这些条件放在美国一流学校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是我已经在美国经营多年，得到终身教职之后是打算陪伴终身的，全职海归这样的大动作还不可想象。陈校长并不理会我的犹豫，说你可以先申请青年千人，拿到之后再作计议。

辞别陈校长，系主任又带我逛校园、喝咖啡。五年前这里

2 “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学术圈俗称青年千人、青千或青青。



还是一个村庄，现在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图书馆前的一棵根深叶茂的老榕树。中学课本里读到的深圳速度现在就活生生呈现在面前。陈校长描绘的美丽蓝图，眼前真切的日新月异，以及除七前后的各种数字都在我脑海中盘旋。更神奇的是，不知为什么，在学术的江湖漂泊了这些年，忽然来到这里，非但不觉得陌生，反而有一种置身桃花岛的舒适感觉，想在这里歇脚停留。那一刻，嘴角微微一笑，心中微微一热，一个小火苗冉冉升起。我对系主任说：要不，我们先申请个青千试试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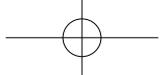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走，回中国——美国终身教授海归南方科技大学全纪录



人才的标签

陈校长谈话时还说了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不想当院士就不用来南科大。

院士是学术界的崇高荣誉，而中国的院士更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科教相关话语权及连带利益的，没有之一。近年来，学术界对通往院士评选的一些里程碑认识逐渐趋于统一。认识统一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是前续步骤也被公认变得清晰，并随之标准化。



这个过程每迭代一次，起跑线就被往前画一步。

有意思的是，在国内跟上海、江苏的同学们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使孩子们的起跑线也逐渐前移，导致幼升小都如临大敌。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写的《异类》（*Outliers*）举过加拿大职业冰球运动员选拔的例子，道理也是一样一样的：在每一年龄段出众的孩子会被选为下一年的重点培养对象，享有更好的教练、更厉害的对手、更多的比赛机会，从而更早地保质保量攒够1万小时成为冰球精英。这样逐年往前推，直到最早选拔上的孩子都是春天出生的，因为他们的生日最接近报名截止日期（1月1日），在起步时拥有最大允许年龄带来的最好体能。我猜一定会有“打鸡血”的加拿大夫妇以早春时节为目标生日来倒推备孕，制造冰球宝宝吧。

按这个趋势，院士和高考已经几乎可以对接起来。半开玩笑地讲，也许若干年后院士的典型养成路线从高级到初级大致是这样的：

院士，长江学者³，杰青⁴，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名牌大学本科，省重点高中，市重点初中，区重点小学，奥数小神童，幼儿园小天才，胎教积极分

3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

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子，优生优育标兵。

这里最接近金字塔尖的长江学者和杰青也是含金量最高、竞争最激烈的人才计划。我对人才计划的看法比较温和，认为它们的存在有其现实及合理意义，因为大众无法在瞬间评判一个学者的大致水平。各种人才计划类似产品认证，选拔通过的人才就可以戴上这个标签。如果选拔过程靠谱，相应产品也没有砸标签的牌子，口碑就可以逐步树立起来了。这种方式远非完美，但恐怕是目前能获得效率与相对公平的不得已之举。人才计划和第一学位的情况类似：高校的“985”和“211”标签虽被广泛诟病，但把任何人放到招聘主管的位置上，面对海量简历和有限的资源，想迅速进行第一轮筛选，查找“985”和“211”标签是可以做到八九不离十的唯一办法。

杰青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持选拔，每年200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则是由教育部主导的，狭义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不包括讲座教授和青年学者）每年约150人。考虑到长江和杰青还有不少的重叠，所以两大荣誉虽然权威但数量稀缺，远不能满足泱泱大国对各种人才认证服务的需要。而中国既不缺人才也不缺名山大川和名水大河，各省市也纷纷推出黄河学者、泰山学者、楚天学者、天山学者、闽江学者、赣江学者、珠江学者等。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曾统计类似名号有38个之多。这些名号虽然使标签数量增加，但评审过程和标准不一致，认证结果也缺乏



全国流通的效力。

于是就顺势产生了国家层面选拔评估的、兼顾数量与质量的人才计划。这就是由管干部的中组部推出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又称“千人计划”⁵。实施近十年来，“千人计划”逐渐清晰地定义了海归的套路。

正教授可以走“千人计划”，国家只要求“原则上”每年六个月在国内工作。这样大千人的海外位置可以不放弃，只利用寒暑假、春假、秋假、学术休假等时间就可以保证六个月的兼职。虽然有不少人批评某些大千人不全职在国内工作的情况，但我认为兼职一样甚至更加有意义。从充分发挥价值的角度讲，大千人的主要意义在于构建团队平台和把握科研大方向，用一半时间亲临指导，另一半时间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保持海外学术界的“存在”对维持他们的国际江湖地位和双向学术交流也有很多益处，是使他们保值增值的方式。从实际操作来看，正教授的子女通常已经在上中学并深深植入海外文化与生活，强迫举家全职海归既不人道也不现实。

博士后可以走“青年千人计划”。中组部把“青年”的截止线划到40岁，并且要求有海外三年以上科研工作经历。青千必须全职，这是各个方面的共识，监督和实施得也颇严格。一方面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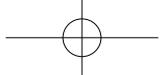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5 “千人计划”，学术圈俗称大千或国千。

国家需要青年才俊在本土科研的第一线拼搏；另一方面博士后通常是三十挂零甚至不到的年纪，子女尚小或者干脆没有，后代教育对全职海归来说一般不构成一票否决。

而海外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这里统称AP）则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因为从学术阶段来说，AP应该对标在大千和青千之间，而中组部并没有衔接这两者的人才计划。如果AP想海归，要么等三年到十年升到正教授申请大千，要么现在去和博士后竞争申请青千，要么就是没有帽子裸归。而裸归将失去很多配套资源，以南科大为例，是不是青千在科研启动经费上可以相差500万元人民币。

所以，有不少同行朋友跟我说：你申请青千不划算，过几年直接申请大千吧。可实际上，几年时间听起来虽然不长，却是极其关键的几年：孩子在一天天长大，适应会越来越难；国内合适的位置也逐年减少，近年来有些顶级学校已经呈现饱和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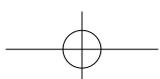
初见陈校长时我刚一个人过完39岁生日不久，将将可以追赶青千的末班车。一旦动了海归的心思，虽然嘴上说是申申看，但实际上已经是等不及、等不起、必须申、必须中的心态。



走，回中国——美国终身教授海归南方科技大学全纪录



邓巍巍教授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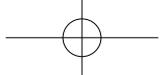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第
六
回

三体

见过陈校长的那天晚上，我给地球那头的媳妇打电话讲了当天的见闻和回国的念头。

“什么？海归？全职？今儿忘吃药了吧？”她在电话那头连珠炮似的问号辐射着强大的气场，虽千万里如妻亲临。她的反应我并不意外：一是因为她是典型的白羊座，二是因为海归是个陡峭的阶梯函数，必然会激起情绪的振荡。



“现在还只是初步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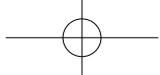
“你的教职怎么办？我怎么办？娃怎么办？”媳妇显然解读出我的想法并不那么初步，直接指出了问题的核心：三体。在美国换工作经常牵扯到的只是双体问题，孩子跟着搬家影响还不算大；而跨国迁徙则是硬要给娃在中西文化中长大之间选择一个，这使本来就复杂的情况更加难以理清楚。

媳妇对海归的立场至关重要，因为她是家里的“*No. 1*”，对家庭事务决断可谓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一票否决。家庭地位和其他地位的获得类似，很少有偶然，多数是要凭实力和努力。媳妇和我是大学同班同学，也是我见过的智商与身高乘积最高的女生。从大一开始她成绩就一直比我好。比如学线性代数的时候，我对这个以前从没见过的数学新物种简直是一头雾水，想问问题都找不到北，只能很羡慕地看她下课后和老师讨论切磋谈笑风生。她思维之敏捷和“非线性”常令我十分佩服。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阵子实验很不顺利，因为一台关键的水冷激光经常在取数据的关键时刻罢工，折磨得我百思不得其解，逢她便像祥林嫂一样抱怨：我这个激光真是怪，白天两三分钟就停工，晚上和周末则好一些。她头都不抬地说：“可能是因为有人冲厕所吧。”我将信将疑地约了实验室的小伙伴做了冲水测试，果然那边一冲水，这边水压就骤降，激光水冷失效就引发断电保护。于是我重接了独立水路，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她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风冷散热。虽然哈雷戴维森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标志品牌，也是大家都觉得很酷的课题，但她感到这并不是自己将来想做一辈子的方向。读博士的时候她去耶鲁大学医学院找老师谈，其中一个做核磁共振成像（MRI）的教授跟她介绍了用核磁共振成像诊断肝硬化的课题。她告诉教授她可以利用流体力学模型从肝脏血液流速推出压力变化，这个值会和肝硬化程度正相关，可以作为定量诊断依据。教授有些兴奋，但紧接着问那大人和小孩肝大小不一样可怎么办；媳妇秒回：拿肝的体积除一下（normalize）就好了。教授两眼放光，当即招她进实验室，她也华丽转身切入到前景和“钱景”俱佳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她的简历还包括在克里夫兰医院（全美排名第二）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美国1/5的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都由FDA直接或间接监管）的工作经历。她现在是弗吉尼亚大学（UVA）医学院的助理教授。弗吉尼亚大学侧重文医法商，在全美公立大学中综合排名长期占据前三，甩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几条街。有这么一个媳妇，我在骄傲倾倒之余，既倍感压力也平添许多动力。

“你倒是说话呀？”媳妇在电话那头催道。

“你过两个礼拜不也就回国度假了吗？我们一起去深圳转一转，看看情况再说。你如果很不喜欢那个地方，我也就不再提这个事儿了。”我建议，她同意。



两周后我和媳妇来到了南科大。力学系的系主任出差了，是机械系的系主任融老师接待的我们。融老师是大千人，在美国做了多年讲席教授（chair professor），人特别好，在夏至前后的大热天带我们在校园散步，在展览室指着沙盘介绍情况，给予我们很多鼓励和正能量。媳妇很感动也很感慨：在美国是公事公办，人与人之间的礼貌背后透着冷漠；而融老师给人如沐春风的舒适感，和这样的师长共事一定会很和谐愉快。

因为考虑到娃的教育，我们又去参观了两所国际学校。设备的确很新，学费也与美国私校看齐，但除此之外感觉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高中部毕业生考上的大学不算出众，学校追求利润的气息尤其浓重。最后去看了公立的南科大附属实验小学，反倒眼前一亮。因为是新小学，最高的班级只有三年级。带我们参观的老师低调、务实；教室的桌椅设置活泼、科学；学生们看起来也很开心。用起新技术比娃在美国的小学更甚：每个学生都要求配有iPad，而且要求打字速度每分钟至少若干字。走廊的柱子上贴着许多基于学生艺术作品的海报，风格多样，有些水准颇高。顶楼有个漂亮温馨的玻璃暖房，里面种着各种花花草草，是一个引导学生欣赏植物和自然的好去处。最让我有共鸣的是学校中心位置的墙上贴了一副巨大的调色盘一般的《多元智能示意图表》，用中英文说明八种智能（intelligence）：人际、内省、韵律、身体、语言、数理、自然、空间。我和媳妇对望一眼，频频点

头。在这个显著的位置宣扬这种理念说明学校的价值观非常现代且科学。娃在这里上学我们多半是放心的，担心的恐怕是中文一时半会儿跟不上。

媳妇在国内期间我们还一起跑了其他几个大城市，而她最喜欢的还是深圳。度假结束，送她去机场。临别时她神情复杂地说：“我这次是想找一个明显的否定你回来的理由。可是，我没有找到。”